



□ 李秀潭

钱钟书，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巨匠。他身兼学者、作家两重身份，是一个学者型作家，又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。作为学术大师的广博和睿智，其为人求学，如奇峰瀚海，被文化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“文化昆仑”。

博学鸿儒

钱钟书出生于美丽的无锡。钱氏家庭推源极古，可溯及五代吴越王钱镠。传说钱镠指挥大军发箭射潮，修筑海塘，造福百姓。所谓“钱塘江”即得名于此。钱钟书父亲钱基博，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者，清华大学教授。母亲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之妹。钱钟书父亲为他取名“钟书”，源于他周岁“抓周”抓了一本书，这正是他一生钟情于书的恰切写照。

钱钟书学贯中西的学术成就，与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，其基础来源由学校教育、家学和自学三方面组成。他接受的学校教育以西学为主。钱钟书少年时期就读的主要是教会学校。教会学校极为严格的教学，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基础。家学以国学为主，钱钟书由此扎稳了极为坚实的古文根底。钱钟书以后恢宏的知识结构，由此奠定。

1929年，钱钟书中学毕业，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。20世纪中国现代大学中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居领先地位。当时北大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较浓，清华则更接近于西洋文化。而清华早期的师资，很多来自北大。校长罗家伦、中文系主任朱自清、哲学系

主任冯友兰、教授陈寅恪、吴宓等，皆一时之选。这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，对钱钟书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形成大有裨益。钱钟书自觉地进行着中西文两路的进修，奋发不已，锋芒初露，被同学誉为清华“三才子”之首（其余二位是考古大家夏鼐和历史学家吴晗）。

1935年秋，钱钟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，与夫人杨绛一同赴英牛津大学留学。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。牛津严谨的学风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，极大地提升了钱钟书的知识修养和外语水平。1937年他在牛津大学毕业，又和杨绛一起至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，研究法国文学。巴黎大学是欧洲最早的教育中心，钱钟书由牛津到巴黎，感受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不同学风，更深入地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和文学，也给他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、运用和体味的机会。对他后来发挥所学，对欧洲各种文化和文学兼容并蓄及融会贯通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938年夏，清华大学函聘钱钟书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。他和杨绛携女儿学成回国，结束了求学，开始了人生新阶段。

回国前期，从1939年至1949年，钱钟书由青年而中年。最早的作品是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（1941年），其次是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（1946年）。而真正的代表作有两部：一是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（1947年），一是理论著作《谈艺录》（1948年）。两部著作奠定了他毕生写作的基础。

1949年至1976年，钱钟书由中年渐转老年，发表的著作不多，仅在50



年代完成一本《宋诗选注》（1958年）及60年代的若干篇论文，这一阶段主要以学术积累为主。经过长时期的酝酿，钱钟书终于完成从《谈艺录》到《管锥篇》的飞跃。1978年《管锥篇》初辑整理完成。

改革开放新时期肇始，钱钟书的研究进入成熟期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，是1979年《管锥篇》一至四册的出版。《管锥篇》书名取自《庄子·秋水》“用管窥天，用锥指地”，自谦小见之意。全书由781则札记组成，分10卷。用典雅的文言文分别评论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10部中国古典要籍。内容涵盖哲学、宗教、历史、训诂学、修辞学、文化人类学、心理分析学、悲剧心理学、比较文化学、比较诗学等。这部书横贯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气魄宏大，内容浩瀚，文采斐然。征引典籍涵盖古今中外，涉及作者达4000多人，其中

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人以上，包含中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拉丁语各种文字的典籍近万种。在这部晚年集大成的文化巨著中，钱钟书以独立思考、深广忧愤的学术良心，注释了历史，注释了社会，注释了人生。代表作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总体认识，是一部凝聚社会人生智慧的思想宝库，是中华文明殿堂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，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座高峰。

淡泊人生

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。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师。1990年根据《围城》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，钱钟书这三个字更如日中天，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。面对鲜花和掌

声，钱钟书保持了相当的冷静与理智。他是个对人生看得最透彻的人。“福过灾生，誉过谤至。”对他来说，名与利皆等之浮云。钱钟书就是钱钟书。在载沉载浮的年代，他历尽春秋，不务虚名，落落甘甘，淡漠毁誉，宠辱不惊。他没有“大师”的气势和派头，有的只是甘饴寂寞、澹泊自守的学人品格及精神。

钱钟书是个“钟情于书”的大学者。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那样的“照相机式”过目不忘的天赋。但他的博学，更主要靠他的用功与勤奋。钱钟书这个名字，首先就意味着读书。在清华大学读书时，他就立下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的志向。孜孜兀兀，努力以赴。工作后他惜时如金，杜门寂处，足不出户，笔耕不辍，潜心读书研究，不爱应酬，不好拜客访友。客来常以病谢，积函多不作复，不浪费光阴于交游。钱钟书电话告诉想拜见他的一位英国女士说：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，又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”学术是寂寞的事业。他对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、学会活动，深为不满。请帖征文，概置不理。坚守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。

随着钱钟书著作影响的扩大，在欧美、日本、港台和国内，“钱学”方兴未艾。中国士风，“好事者”多。有的创办《钱钟书研究》刊物，有的大学招收《管锥篇》研究生，有的成立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博士班，有的称誉他为“文化昆仑”。对此，他极力反对。他向作家舒展抗议：“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。”他在给首创“钱学”的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的信中写道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（野）老屋中二三素心人

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在钱钟书眼中，一切“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”的学问都是“俗学”。钱钟书为人令人钦佩之处，就是绝不“攀龙附凤”，绝不“群趋若鹜”，绝不“随人俯仰”，绝不“巧宦曲学”，绝不“媚世苟合”。“大学问家的学问，跟他的整个性情陶熔为一片”。钱钟书先生人格的魅力，文章的魅力，无不与他整个性情相关。

近年来，有关钱钟书先生不图钱财的佳话为世人津津乐道。在他回答电视剧《围城》片酬问题时说过一段话：“我都姓了一辈子的钱，难道还迷信钱吗？”对待钱，他在巨著《管锥篇》中作过精辟分析。他通过晋代《钱神论》等古籍考证指出：古人名钱曰刀。“钱”字旁，上着一“戈”字，下着一“戈”字，真杀人之物也。执两戈以求金谓之钱，亦以示凶害也。“利”旁有“刀”，言人治下率多得钱财者，必有刀剑之祸也。执两戈以求贝，谓之“贼”；执十戈以求贝，则谓之“贼”而已。因此，钱先生一生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历来处以淡泊之心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他拒绝牛津大学、香港大学高薪聘请，举家北上，重返清华大学任教。作为大师名人，他卧室并列两张单人铁床，其余都是箱子、柜子等半旧的老式家具，没有一件现代化的装备。从这种生活小处可见钱先生之大气节，亦见先生之真性情真人格。生活对于他来说，朴素的就像他终生坚守的真理那样。

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，当时钱钟书尚有宏大写作计划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直到1998年钱钟书仙逝，在20余年中，除了出版五册《管锥篇》为新撰之文外，其他多为旧籍新刊重印。新撰文章多为讲演稿、序跋、纠谬等应景之文，再也未能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，只留下一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。这不能不是钱先生晚年的一件憾事。

彼岸未达，斯人已逝。未逝的是其素养和精神。

追求做好人的高攀龙



□ 胡海升

高攀龙（1562年—1626年），字存之，又字云从，江苏无锡人，世称“景逸先生”。明朝政治家、思想家，“东林八君子”之一，著有《高子遗书》十二卷等。高攀龙的为官之路，充满着坎坷与艰辛，但他总能保持秉直之心，始终以一个“好人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同流合污，因而被后人所敬仰。

高攀龙自幼发奋苦读，颇知礼仪。当时，罗懋忠和顾宪成作为文坛领袖，名声极大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，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二人前来讲学，高攀龙以学生身份聆听了他们的教诲。这次讲学触动了高攀龙的心灵，从此确定了治学方向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，高攀龙高中进士，因养父高静逸仙逝，故高攀龙归家守孝。

三年守孝期满，高攀龙于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步入仕途。因其颇知礼仪，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，执掌传圣旨、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。仕途之初并不烦劳，反倒是比较清闲。这给了高攀龙阅读与学习的机会和时间，他大量阅读行人司中的丰富藏书，深入钻研程颐、程颢和朱熹等人的著作，并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《读书录》，并对其“一字不可轻与人，一言不可轻许人，一笑不可轻假人”的处世态度倍加推崇。在此期

间，高攀龙编写了《日省编》，记录先朝思想家的语录，并附之在《大学》章句之下，以此作为初学者学习的指南。另外，他还将有关儒、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《崇正编》。

高攀龙前往揭阳就任，于船上订立严规，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，不为外界所干扰，秉持良好的家风。到揭阳后，高攀龙一方面在官衙教授学生，培养年轻人，把高氏的良好家风传播开来；另一方面走访民情，惩治地方恶霸。高攀龙在揭阳的半年多内结识了陆精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，这二人对高攀龙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。

高攀龙在揭阳做了7个月的典史，因家事辞官归家，不久亲人病故，始终在家治学，传授年轻人知识。

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在常州、无锡二知县的支持下，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，并每年举行“东林大会”。起初由顾宪成负责主持，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后，因顾宪成去世，改由高攀龙主持。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高洁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，裁量人物。当时有许多志趣相近的在朝、在野的有志之士闻风响附，纷至沓来。如李三才、赵南星、邹元标、杨涟等。那时候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，可谓明末混沌大背景下唯有清流。
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熹宗即位，东林党人因在“国本之争”中拥立有功，被一一重新启用，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，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又被进封为光禄少卿。此时，明军在关外与后金作战颇为不利。1622年，关外重镇广宁（今辽宁北镇）失陷，明军被迫退至山海关一线。消息传来，满朝震动，人心惶惶。在此危急关头，高攀龙接连上书熹宗，要求革新政治，以挽救危局。他在《破格用人疏》中提出要破格用人，加强战守之备，并推荐名将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，负责处理战事。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。孙承宗也不负众

望，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，使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。

好景不长，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八月，魏忠贤矫旨，拆毁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全国的所有书院。高攀龙对此慷慨激昂地回以“我本视死如归”六个大字。面对步步紧逼，高攀龙生无所恋，终于自沉于池塘，时年64岁。

崇祯初年（1628年），朝廷为高攀龙平反昭雪，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谥“忠宪”。

高攀龙严于律己、治学严谨，不但秉承了祖父、父亲良好的家风，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地将家风传给后世子孙。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：吾人立身天地间，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，余事都没要紧。做人的道理不必多，只看小学便是，依此作去，岂有差夫？从古聪明、睿智、圣贤、豪杰，只于此见得透，下手早，所以其人千古不可磨灭，闻此言不信便是，凡愚所宜猛省。做好人，眼前觉得不便宜，总算来个大便宜。做不好人，眼前觉得便宜，总算来个大不便宜。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此迷人，尚不觉悟，真是可哀，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，不可草草看过。

高攀龙不但以一生的追求践行了一个好人的志向，而且以此来告诫后世子孙要做一个好人，虽然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，但平凡的家书，在字里行间却展现着一个人正直、超拔的性格。难怪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董必武对其赞叹有加，并赋以诗文：“东林讲学继龟山，高顾声名旧史传。景仰昔贤风节著，瞻临履闕学弥坚（诗中“高顾”指高攀龙和顾宪成）。”

“做一个好人”的家风虽朴实，但所包含的哲理却不简单，值得我们去认真领悟与继承。

随想录

得人才者得天下。眼下，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和经济转型速度的加快，新一轮的人才大战在全国各地揭开序幕，如火如荼，方兴未艾。许多省市纷纷公布人才引进目标，出台各种优惠政策，努力吸引人才，希望在人才大战中赢得先机，拔得头彩，为日后大发展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础。

人才有三部曲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敢抢人才是第一步，体现出的是魄力与见识。在人才问题上首先要看魄力，即要有超前的意识，敏锐的眼光，开阔的胸襟，敢于担当的精神，不怕负责任的态度，做到谋事在先，动作要快，格局要大，措施要实。其次，要有见识，头脑清醒，方寸不乱，不追风起哄。要明白抢人才不能乱抢，要给自己需要的人才准确定位，知道急需哪种人才，目标明确地去按图索骥，有的放矢。人才分高中低三大类，并不是学历越高职称越高名头越大就越好，关键要适合，来了就要用得上，要避免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的尴尬局面。因而招考人才一定要从实际出发，自己所在省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，自己的薄弱环节和发展方向是什么，最需要的是哪一类人才，都要心里有数，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捡到筐里都是菜。

会养人才是第二步，体现出的是能力与实力。昔日，春秋战国四大君子争相养士，招徕各路人才，其中孟尝君就养士三千。这些人要吃要喝要过日子，还一个个脾气挺大，动不动

就搞挑子，可是孟尝君始终小心翼翼地养着他们，这些人才也没辜负他，都在关键时刻给他帮了大忙。而今眼下，养人才的意义也不可小觑。人才辛辛苦苦抢来了，原先给人家许诺的条件就要一一兑现，不能打折扣，不能缩水，不能口惠而实不至。要养好人才，就是时下常说的三句话，要以待遇养人，以事业养人，以情感养人。具体来说，工资收入要有明显提高，住房要有相应保障，生活上要十分便捷；在工作中要受到重用，能使出劲儿，发挥才干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；领导对人才要问寒问暖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，有浓浓的人情味，使他们处处感到温暖，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，值得在这里大干一场。

善用人才是第三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体现出的是智慧与水平。当年，殷纣王手下有很多人才，微子、箕子、比干皆是人中龙凤，治国大才，他不仅皆不能用，还被他逼得死的死、逃的逃、疯的疯，最后的亡国命运是逃脱不了的。韩信、陈平，原来都是项羽手下的人才，他不用，后来都跑到刘邦那边去，成了刘邦争夺天下的得力助手。今天也是如此，人才辛辛苦苦抢来了，花钱费力养得也不错，下一步还要把人才用好，做到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。
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成千上万人才的大显身手，各尽所能，必然会迎来中国经济繁花似锦的无限春光，迎来人民幸福富裕的美好生活。



人才抢来之后

□ 陈鲁民



荷之悟语

阿里·摄

